1991-2011

重构苏联解体研究的中国议程

杨成
华东师大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

20年前，苏联作为一个庞大国家不复存在，这个当时令所有人难以置信的事实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此后中国思想界关注的核心命题之一。

20年后，一家俄罗斯媒体用“激情的90年代——20年后：父辈不再记起、孩子不会问起”这样一个伤感的标题将民众再度导入到历史的现场。中国的苏联解体研究在2011年12月25日前后也重新获得了相当的具体感，成篇累牍的报道、分析和评论不断涌现。

这种现象再度折射出中国人难以割舍的俄苏情结。我们已习惯将苏联和解体之后的俄罗斯视为一个反观自身的参照系。

显然，1990年代之后，中国精英界对于苏联和俄罗斯的审视缺乏雄厚的学术基础且日益意识形态化。在另一方面，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各界受到西方智识的影响越来越大，西方构建的“苏联形象”和“俄罗斯形象”对我们在这一问题上的认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种中国俄苏问题研究中的“无意识的意识形态化”，构成了中国近20年来对苏联解体研究和认知的宏大叙事背景。

总结起来，我国学界多半将苏联解体归因为苏联的某种难以通过改革消除的先天性缺陷：或是民族问题，或是“斯大林主义”、“斯大林体制”、“斯大林模式”，或是戈尔巴乔夫作为共产主义事业叛徒所进行的改革，或是西方阴谋，或是经济落后，或是内因和外因合力，甚至将之上溯至十月革命。各种观点林林总总，看起来似乎每一家观点都触及问题核心。但实际上这些解答远不够完善，围绕这些观点构建的知识体系远难令人信服。

隐隐约约之间，我们看到一种“格式化”的论述：从最初的“以俄为师”到“兄弟之邦”，到谁是正统的“社会主义”之争，再到冷战结束后的中国优越论，以至到近来出现的所谓俄罗斯“以华为师”之说。

这种模式化的叙事忽略了苏联解体的真实图景，忽视了俄罗斯发展的独立人格。更大的问题在于，最近20年来我们在苏联解体研究问题上往往只是为了验证自身，而不是回到历史的脉络和情境中去体会和理解这一进程，因而在结论上很可能会无意识地忽略一些关键点，并因此无法传递苏联解体的本质，所得到的也多为伴随着扭曲和不可能显露真理的叙述。

基于此，我们对于苏联解体问题的很多看法，以及根据这种看法而在国内政治场域中形成的种种政策思路，可能有相当一部分需要重新检讨。有的观点、看法甚至已经固化，但事实上未必就是正确的。这使人不能不产生一种紧迫感、一种忧虑意识。因此，重构苏联解体研究的中国议程这一迫切任务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在我看来，迄今为止中国在苏联解体问题上存在着几个基本“遗憾”：

研究缺乏“真问题”

首先，不少作品与真正的学术研究相距甚远，实际上消解了苏联解体的命题本身。学术书写的首要出发点是客观、理性、严谨，基本要求是力争还原事情的真实性、多面性和复杂性，而不是为迎合某种既定议程而对问题、叙事、论证进行修饰或扭曲。如果说学术研究要为政治服务，那也只有从实际出发、真正反映实际情况和事物本质的研究才是有用的研究，才符合民族和国家的最高利益。

中国知识界围绕苏联解体问题进行的研究往往有一种比附的倾向，而不是就苏联解体问题本身进行恰如其分的讨论。从这个意义上讲，为数众多的苏联解体研究可能不是学术研究，而更像是一种意识形态工作，与此相关的思考与论述大致上或皆可归类为“伪问题”而不是“真问题”。这恰恰使得苏联解体的“真教训”被“伪知识”所阻断而可能难以成为中国的政鉴。也就不可能引发出具有建设性的对中国成长问题的深度讨论，进而不可能对中国未来中长期内可能遭遇到的大量问题进行前瞻性的知识准备、理论准备和对策准备。

缺乏微观考察

其次，讨论议题过于集中化、过于宏观，缺少细致入微的考察。20年来，我们围绕苏联解体所展开的讨论，双方都拿斯大林模式、苏联解体等老问题说事，但几乎未见严格意义上的新的“有意义的问题”。有些还在重复着“从概念到概念”的思路，而且也甚少进入到问题的深层，缺少微观、实证、具体的研究。整体而言，我们的研究在问题导向上基本集中在政治、安全等高端政治领域，很少对社会史，尤其是生活史等底层向度的成体系的考察。

中国学人擅长宏观研究是有历史传统的，我们喜欢抓住主要矛盾，抓住最核心的东西，这是我们的长处，但这种宏观把握能力并非所有人都具备。而且，注意大面忽视中观和微观情境可能的缺点在于，由于在具体操作上我们对苏联解体问题的研究没有能够深入进去，没有能够做到像美国著名学者杰维斯所表明的那种立足于简单性基础之上去研究复杂性，使得我们的认识支离破碎，甚至可能因而忽视了这一复杂历史进程的细节。

冷战期间国外的苏联研究，和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有诸多类似之处，如学术客观性经常被政治偏见所遮蔽，或过左（对苏联毫无敌意）或过右（对苏联太多敌意），对政府基金的依赖使得官方可以轻易地设定学术研究议程；更多关注苏共中央领导集团的动态，很少注意对苏联社会基本矛盾演变的跟踪；偏重对苏联主流社会的政治分析，缺乏对当地语言和历史、尤其是苏联内部非俄罗斯族地区的深度介入等等。但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后，国际同行，包括俄国学术界的研究显然有相对更为深刻的思考，尤其是在苏联解体研究的微观史、社会史、地方史、民族史方面都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新文献使用不多

第三，在新文献、新资料的使用上进展不大，二手资料仍然充斥中国的苏联解体研究领域。在短暂的“休克”之后，国际俄苏研究学界很快为苏联解体带来的研究空间而兴奋，一种火山迸发式发展的可能正在出现。这一学科的新的增长潜力首先应该归因于大量研究文本的问世，即过去出于高度保密或蓄意虚报的社会和经济数据得以公布以及大量档案文献的逐步解密，为我们进行苏联解体问题研究提供了全新的信息空间。

有数据显示，截至2005年，苏联及俄罗斯国家级档案馆和自治市级档案馆共解密了1260万件档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等国际知名研究机构专门建立起相关档案。各国学者以俄罗斯解密档案文件以及其他被公开的数据为基础，对原先被视为研究禁区或难点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展开了深入研究。当西方学者，包括日本等亚洲同行，利用苏联解体所带来的信息大爆炸良机作为验证各种理论的试验场之际，中国的苏联解体研究仍然基本保持了一种自娱自乐的孤岛心态。

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国在苏联解体问题研究上所表现出来的“正反感情并存症”。我们一方面习惯于为苏联的一些政策辩护，另一方面又对苏联的内外行为过度诠释。而且中国学界围绕苏联解体问题的很多争论的展开和持续，经常会演化为对对方道德的猜测，对论据的吹毛求疵，对论点的断章取义的攻击。一些论者引用资料表现出实用主义，往往是各取所需，断章取义，而缺乏应有的分析，没有对其予以全面把握。在这些论证中我们往往看到的是话题的偏离、证据的平行、焦距的失衡，看似想要相互击掌，却又彼此滑门而过。

理论准备不足

第四，方法论和理论准备不足，难以承担嵌入历史情境且深具有效性的分析。如果说西方学者倾向于追求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论而更多在苏联解体问题上“套模型”的话，我们的苏联解体研究很大的问题可能在于“理论的贫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似乎非常抗拒理论，但理论的重要性其实是不言而喻的。如同挪威国际关系理论史学家托布约尔·克努成所指出的，学术从业者与其他议论、阅读和撰写国际政治的人的区别在于以下两点：一是“方法”，学者用方法论为自己压舱，在面对问题的时候能够获得特定科学技术哲学和学术规范的指导；二是“理论”，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能自觉地沿着一条前人已经走过几个世纪的道路来探究战争、财富、权力以及和平等问题。

上个世纪80年代末已经有学者意识到这一问题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读书》曾专门刊文以经济问题研究为例严厉批评，指出“如果说在国内问题的研究中已经开始运用了这些工具的过程，那么在苏联问题研究中，还看不到哪怕是一点这样的迹象”。

苏联解体后，西方学术界开始反思为什么未能预测到苏联的结局，首先着眼点就在于方法论的反思，而我国学界至今没有深刻地检讨我们从自身知识、思想状况到研究路径方面的深层问题，从而在相当程度上丧失掉与国际同行同步前进的历史契机。

在我看来，从方法论的意义上讲，体系性因素之于苏联解体的作用固然重要，但我们还应有更宽广的视野，才有可能较为客观地认识苏联解体这样一种复杂的过程。我们不能仅满足于充当一个旁观者，而必须进入到苏联晚期的背景之中，借助“移情”的手段透视这一段历史。我们可能还应关注很多行为体因素，尤其是社会性因素，甚至一些偶然因素。比如，苏联解体的过程是怎样在苏联人民的心灵地图中慢慢完成的。作为一个政治进程和作为一个社会进程的苏联解体是完全两回事。甚至这种心理进程，或者说帝国解体的心理进程至今仍没有完成。俄罗斯从精英到大众至今仍然不能适应身份的转换，经常自然而然地忽视前加盟共和国已经变为国际关系和地区秩序中有完全或不完全行为能力的行为主体这样的事实。

国际化不够

第五，国际化明显不足，限制了我们的知识和思想视域。

美国学者罗兹曼认为，上世纪80年代妨碍中国在苏联问题研究上的全面繁荣，至少不乏国际化程度不足的原因，即中国俄苏研究的成果绝大多数用中文撰写，很难让苏联学术界了解和熟悉，也基本上没有作品直接用英文撰写或翻译成英文，这限制了中国的俄苏问题研究学术圈和国外（非苏联）学术圈的互动。应该说，这些问题也是由历史上承继下来的，至今都没有得到全部的解决。

比如关于“斯大林主义”的讨论，俄罗斯国内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要比我们深入得多，俄政治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已经出版了上百本专题类研究著作，大大丰富了国际学术界对斯大林模式的知识想象，但这些内容尚未被全面引入到中国语境。类似的，很多国际会议基本未见或很少见到中国俄苏研究界代表的参与，更不要说参与西方学界的内部对话了。

这样，越是研究不足越难平等参与国际对话，也就越是获得不了前沿信息，相应研究也就越来越多仅仅是“自我陶醉”的作品。这其实是一种恶性循环。当然，可能在个别问题上我们还是有突破的，但总体而言情况绝不容乐观。

跨学科进展不大

第六，跨学科研究方面进展不大。苏联解体问题具有高度的复杂性，迄今仍是未解之谜，很难说有精确的、科学的答案可言。当下国际学术界的一个共识是，必须推进“学科互涉”，基于承认其“复杂性”的前提下尝试对苏联解体问题进行全方位的解释。相应地，中国在这方面做得还很不够。各学科之间的壁垒依然未能打通，大家更多是自说自话，形成了布罗代尔所形容的“聋子对话”局面，整合性较差。

一言以蔽之，像苏联这样一个庞大国家的解体，我们除了沉思和深入研究，任何感叹都只会显得菲薄。要弄明白苏联为何解体及其影响，就需要学界同仁在知识经验上持续积累，回到问题原点，开展实事求是的讨论。而前提取决于我们能否突破在苏联解体、苏联模式等问题上二元对立的研究范式和非好即坏式的结论，重构苏联解体研究的中国议程，重建我们对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俄罗斯的历史书写。我们的责任在于在追求客观真理和服务中国改革的意识指导下，为国家和社会提供一个尽可能客观、中立、扎实、丰富、多元的实证性的智识供应。